

往事思量

杂书过眼录三集

谢泳——著



中华书局

014005483

G236

52

往事思量
杂书过眼录三集

谢
泳——著



中华书局



北航

C1693187

G236

52

0140024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重思量:杂书过眼录三集/谢泳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11

ISBN 978 - 7 - 101 - 09484 - 8

I. 往… II. 谢… III. 书评 - 中国 - 现代 - 选集
IV.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9236 号

书 名 往事重思量——杂书过眼录三集

著 者 谢 泳

责任编辑 于 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frac{1}{2}$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484 - 8

定 价 22.00 元

出版前言

这本《往事重思量——杂书过眼录三集》是谢泳先生个人出版的第三本“杂书过眼录”，书中收集的是作者2010年至今发表在各种刊物的读书札记。谢泳先生在书的“后记”中说：“文字工作，传记可作，掌故笔记可写，史料能搜集，地方文献可整理。此外的文字工作，就要非常谨慎，选择不好，一世努力，可能留不下什么痕迹。”本书中的内容大概就是属于“掌故笔记可写，史料能搜集”之属。全书分为三辑，分别是“书·事”、“书·史”以及“书·信”，需要交代的是，这里的分类并不是严格的分类，主要是为了照顾读者阅读的方便。

目录

出版前言

书·事

鲁迅与林庚白	3
周作人的一首佚诗	6
解读一则日记	8
陈寅恪批评自己的学生	11
有关陈寅恪的一条史料	16
陈寅恪与唐稚松	20
陈寅恪解“瑟瑟”	23
陈寅恪与学生	25
胡适的直觉	29
胡适关心黄晖	32
胡适的“国企观”	35
钱基博捐赠文物《说明书》中的人事	38
《遗珠》好	41
也说为周鍊霞辩“诬”	45

周鍊霞与林松峰	48
重读《洪业传》	51

书·史

由《绿波传》的一则史料说起	57
闽县李氏硕果亭藏书目录	61
孙伯绳的两本油印书册	64
关于洋装书	70
李慎之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	73
张芝联译《英国大学》	76
李拓之译《英译唐诗选》序言	80
新《北云集》删诗二首	87
陆永恒《中国新文学概论》简介	91
关于梅兰芳的一条史料	100
学部委员中为什么没有法学家	104
方便面源出厦门	112
福建稀见地方文献五种	115

书·信

卢弼书札七通：致钱基博、钱锺书	131
萧乾的两封信	141
李克的两封信	146
费孝通的一封信	155
英国旧书店给张申府的一封信	161
黄曾樾致李拔可信九通	171

后记	179
----------	-----

书·事

鲁迅与林庚白

我所见最早注意鲁迅与林庚白关系的文章，是陈漱渝先生《剪影话沧桑》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陈先生所用材料早而翔实，解释林庚白与鲁迅关系也最合情理。

林庚白是福州人，早年文坛上知名的狂士。我南来教书后，也时常听当地人讲林庚白的故事，后读他的《孖楼诗词话》《丽白楼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感觉他见识极高，人虽狂，但绝不妄。1929年的鲁迅日记中，有两处记载林庚白，均非常简略；一处是“林庚白来，不见”，一处是隔了两天，“晚林庚白来信谩骂”。鲁迅日记现有电子版，极易查阅，也不必再详注出处了。据陈漱渝先生文章讲，林庚白给鲁迅的两封信，现存鲁迅博物馆档案中，陈先生一定是读过的，但现在不知是否完整披露出来。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林庚白文集《丽白楼遗集》，手边无书，一时

不好查考。

《孑楼诗词话》中有两处提到鲁迅，评价极高，足证陈漱渝先生对鲁迅与林庚白关系的判断。林庚白说：“晚近文人，以左倾称者，余所知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田汉、黄素，皆能为旧体诗词。录鲁迅、达夫各一律。鲁迅作云：‘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不假雕琢，耐人寻味。‘缁衣’句，殆以鲁迅常御和服，纪实而云耳。达夫作云：‘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顶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题诗为报霞君道，玉局清游兴未赊。’诗亦颇似玉局，第三句稍弱。于此有愿与二君共商榷者：‘梦里依稀慈母泪’之句，以诗论固佳，然吾侪士大夫阶级之意识与情绪，盖不自觉地流露，‘布尔什维克’无是也；达夫诗末一语，以玉局自况，而境地殊不类，得毋趁笔之累耶？”（《民国诗话丛编》第6册，第103页）认为郁达夫以苏轼自况，似太随意。认为鲁迅、郁达夫诗不自觉地流露“士大夫阶级之意识与情绪”，非同时代人不能有这样敏锐的眼光。中国现代作家中，擅长旧体诗的白话文都好，林庚白举出的几位，当是显例。

1933年，误传丁玲遇害，鲁迅有诗吊之。林庚白说：“近见鲁迅吊丁玲绝句极佳，此老固无所不能耶？录以实吾诗话。诗云：‘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以论工力，突过义山。”（同上，第128页）此

等见识，此等评价，非大胸怀者不能得出。

《孖楼诗词话》1933年夏天在《晨报》连载，距1929年林庚白求见鲁迅而不得已去多年，依然能这样评价鲁迅，可以想见这位狂士对鲁迅才华的敬佩，这也是对鲁迅文字最高的评价。

周作人的一首佚诗

1941年，傅增湘七十寿辰，当时留在北平的旧文人为他祝寿，寿颂、寿文、寿诗合集在一起，由《雅言》杂志以《藏园老人七秩寿言专刊》名义刊出，列为《雅言》辛巳卷十。

傅增湘的这一段历史，也非常复杂。《雅言》杂志社以他为社长，杂志社地址就在他有名的“藏园”，北京西城的石老娘胡同七号。赞助杂志出版的是汪伪政权的要人，周作人自然也在其中。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的是一位中国名字叫王嘉亨的日本人，瞿兑之、郭则沄等也参与其事，但杂志本身的内容，主要是诗人唱和及对旧文献的保存，特别是对中国近代诗坛来说，所存史料相当丰富，傅增湘著名的“藏园”群书题记，多由此刊出。杂志白纸线装铅印，一共出了三年，共25期，现在旧书网上时有零本散出，但要见到一套完整的杂志，也很难了。

杂志的主要作者是老辈旧人，或者说是遗老遗少。以杂志的

背景来判断杂志的内容，事情就变得复杂，对作者的评价也就非常不易，像周作人、梁众异一类的作者好说，但有些作者的情况，可能就要考虑历史的复杂性，比如启功、黄宾虹、王季烈、谢国桢、冒广生、叶公绰、刘盼遂、刘承干、卢弼、钱仲联、李拔可兄弟等，也为杂志撰稿，应当如何分析这种行为，不是简单下一个结论就能说明历史的复杂性。给杂志撰稿的人，极少用最为习见的真名，而多用别名室号，虽然杂志最后专设“本期作者题名录”，讲明作者真实身份，但于此似可见出当时作者的一点心态。

周作人在《雅言》只露面一次，即刊在《藏园老人七秩寿言专刊》中的一首五言律诗（该卷第26页），我查了一下手边的周作人研究文献，如张铁荣的《周作人年谱》、王仲三的《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发现都没有提到，想可能是一首未入集的佚诗，虽然是一首应酬之作，但感觉多少也有周作人自己的一点心迹在其中，诗不难懂，抄出如下：

先生真大隐，人海任优游。

独享山林乐，难忘家国忧。

丹铅传世业，皓首缅前修，

眉寿应称庆，芜词代献酬。

解读一则日记

《司徒雷登日记》（第63页，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黄山书社，2009年）中有一条关于周作人的史料，原日记如下：

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日：杨兆龙告诉说周作人已得到程潜和其它高级官员颁下的命令而获得赦免了，因为当年周氏也曾为这班官员向日方求过情，只要日方战胜的话是不成问题的。

周作人和程潜是同一时期的留日学生，程潜曾任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湖南省主席，是抗日名将。1949年8月在湖南长沙选择了转向共产党的道路。

在一般的周作人研究中，我印象中还不曾见到直接引述这一史料的，早期如舒芜、张菊香、张铁荣、钱理群、刘绪源等的周

作人研究，近期如止庵、倪墨炎、王锡荣以及日本的木山英雄等。我读书不细，也许别人引用过，而我没有特别在意。

在周作人研究中，这条史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周作人晚年写《知堂回想录》，所记多是小事，有为自己辩解的冲动，但几乎没有涉及核心机密，所辩解的那些活动，一般也多为外人所知，他不过是强调那些事情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一面。周作人入狱的时候，已过了60岁，对人生和世事已有极清醒的判断，也就是说，他明白轻重。对于自己的人生，因为有深入的判断，所以他对自己的最终结局，似乎并没有什么恐惧，他在法庭和事后的那些辩解，也属人之常情，当然对这种态度，可以见仁见智。

周作人是1949年1月26日离开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先在马骥良家过了一夜，然后到了上海的龙炳圻家，一住就是半年多。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此经历有详细记载。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国共间调停，杨兆龙则是当时中国司法界的高层人物，早岁出身燕京，和司徒雷登关系密切，他提到的关于周作人获释的背景情况，虽是一个孤证材料，在真实性上可以讨论，但至少可以提示后人，注意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我曾把自己的这个感想和两位专门研究周作人的朋友交流，他们都不同意我的判断，我当时也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但人对自己判断的事情，往往有些偏好，而这种偏好多出自于直觉，并不是一个理性的严格推断，但这种直觉对于理解复杂的历史，有时候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我自己对周作人和日记中提到的人并没有多少了解，所以《司徒雷登日记》中提到的事，也有可

能是一个传言，甚至谣言，这样的判断是一种理解，但在历史研究中，谣言常常也是理解历史复杂性的材料，对于逼近历史的真实性，提示历史的复杂性，也还不能说绝对没有启发。司徒雷登和杨兆龙都不是一般人物，特别是司徒雷登，他把一种听来的说法记在自己的日记中，这一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判断，杨兆龙愿意把一种传言告诉司徒雷登，也可以理解为他的一种判断。杨兆龙是司法界的重要人物，虽然日记中没有讲明消息的来源，但以杨兆龙的身份，他是有可能知道审判周作人的一些内幕的。

从这则日记及后来周作人的获罪情况判断，当时国民党高层人物对周作人的行为多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一般认为，在周作人获罪的量刑方面，相对是较轻的，习惯的说法是当时蒋梦麟、胡适对他看护北大校产的证明起了作用，还有当时国民党的两位特工人员的证明对他有利。如果我们现在结合这则日记来判断，就会发现这些有利于周作人的材料，从逻辑上观察，有可能是建立在“因为当年周氏也曾为这班官员向日方求过情”这一核心机密的背景下，才真正发生了作用，当然这是不可能公开讲出来的。历史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如果单从这则日记的口吻推断，周作人不但为这班官员求过情，而且还有效果。这个推断如果成立，将来论定历史人物的事功时，就要考虑复杂的历史事实，而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了。

陈寅恪批评自己的学生

1954年3月，陈寅恪开始写《钱柳因缘诗释证》，1964年夏天完成，即后来的《柳如是别传》。陈先生在本书第一章“缘起”中抄录了多首自己的诗。其中有1963年冬天写的两首（一般认为这两首诗完成于1963年冬天，我以为当完成于1964年初，因为《柳如是别传》定稿在1964年夏天，而两首诗恰为“缘起”所抄诗的最后两首）诗题太长，此不具引。其中一首有两句：“高家门馆恩谁报，陆氏庄园业不存。”

这两句诗常为研究陈寅恪的人提起。余英时最早认为是陈先生对当时“学生批判老师”的感慨，而胡文辉在《陈寅恪诗笺释》一书中，不同意余英时的看法。

“高家门馆恩谁报”，胡文辉指出系借用了白居易一首诗的意思，白居易科考时的主考官名为高郢，此句讲座主与门生关系，可理解为现代的师生关系。